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五四期 ——
(二〇一〇年六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6b)

【更正启事】		
【各抒己见】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冯敬兰
【自由论坛】	从冯敬兰的有罪无罪标准看她为宋彬彬所做的辩护	看好戏
【拷问历史】	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	叶志江
【往事追忆】	一则“比赛杀人”传言的辨正	方影竹
【文献资料】	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宋要武
【史海钩沉】	北大附中“文革”初期记事	陈兵
【峥嵘岁月】	“文革”重灾区——北京大学灾难实录	李悔之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更正启事】

本刊 z k 1 0 0 5 d (文革博物馆通讯第五八四期) 在“关于卞仲耘案的凶手(作者：冯敬兰)”标题下刊载了两篇来自博客文章，一篇题为“答复匿名留言”，实际来自 kerriakerria 的博客(2007年12月8日)，另一篇题为“为什么不说出卞仲耘案凶手的名字？”来自冯敬兰的博客。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将两篇来自不同博客的文章都置于同一作者冯敬兰的名字之下。特此更正，并向网友 kerriakerria 和冯敬兰致歉。——编者

~~~~~

#### 【各抒己见】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 冯敬兰 •

仔细阅读了《记忆》48期关于“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的“编续往来”，很高兴能通过这

个渠道听到各种意见。对于几位读者的质疑和批评，更要表示特别感谢。有质疑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批评才会碰撞出新的思想。写这篇文章，谨为再做说明。

我是原北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1991年调回北京，一直供职于国企，2005年退休。

我就读师大女附中期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初中学生，从未进入校领导的视野，甚至不记得和卞校长打过照面，可是她的惨死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1996年文革30年，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题目叫《记忆的疮疤》，想起校长在烈日下躺在小推车上的情景，反复追问自己：那些出身好、教养好、革命感情深的同学，为什么竟在光天化日下殴打、折磨女校长至死？是什么让她们如此残忍和冷血？

有批评者认为，从《记忆的疮疤》到我主持的五人“访谈”，十四年间我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与宋彬彬站到了一起。那么，我就先从这个话题说起。

### 一、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

近年看到高一3班校友王友琴的著名文章《卞仲耘之死》，明确提到8月5日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负责人。一些著名作家、学者也循着这个脉络对宋彬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我重读旧作《记忆的疮疤》，在字里行间寻找，却没有“红卫兵”这三个字。14年前我的文章中，称她们为“最激进的左派学生”、“趾高气扬心狠手毒的打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2006年文革40周年，我又写了《烈日下的集体谋杀》，发在搜狐的博客网站，文中写到：“40年前的8月5日早晨，从校长走进校门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开始执行了。她被喝令打扫厕所，喝污水，被强迫在正午的日头下，把建筑渣土从这里抬到那里……饥饿、病痛、中暑、脱水还不算，不时有女学生过来抽耳光，踹几脚，更残暴的是那些‘监工’（许多目击现场的同学都深深记得她们的名字），她们用带钉的木棒和铜头皮带给校长造成了遍体鳞伤。心灵的恐惧和绝望就不用计算在内了，校长终于倒在了烈日下。”这类文学描写不同于历史考证，笼统地用“红卫兵”代替施暴者也未尝不可。可是，我没有。我不是红卫兵，犯不上蓄意为她们遮掩，为什么我的文字里“红卫兵”没有出现？我想，只因为当时我在校园里没有看见“红卫兵”。那些行为张扬的同学，包括施暴者，后来或许以“红卫兵”的面目出现在抄家、打人、驱逐“黑五类”的“破四旧”行动中，但是8·5那天，她们尚没有明确的红卫兵身份。

2007年9月，现更名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母校，高调、铺张地举办了建校90周年的庆祝活动，由于评选宋彬彬为知名校友，在海内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此前我一直在外地、在企业工作，宋彬彬从来不在我的视野里。我上网查看，不禁大吃一惊，网上流传着多种关于宋彬彬的文字，“宋彬彬——宋要武”原来一直属于公共话题。对她的指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宋要武”组织杀人比赛的，内容实在离奇，我只能付之一笑；一类是“事实”，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负责人，至今拒不认罪，应把她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是当年在校生，尽管知道1966年8月5日导致校长惨死的游斗校领导活动是高一学生干的，但也希望看到切实的新证据，证明宋彬彬是发起、组织或领导者。可是，来势凶猛的舆论审判只有空洞的指控，没有具体的证据。

2007年临近年底，我在博客写了一篇质疑文章，题目是《请放开宋彬彬》。文章中说：“实验中学今年九月的校庆活动，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批评文章多言辞凌厉。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观点，即校方缺少对文革的正确认知，但我反对对宋彬彬本人继续妖魔化。”“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过当年在校的学生（66、67、68三届学生约40个班）有人举证宋彬彬参与暴力的事实，也没有看到过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实据。实际上，在我的

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个戴着白色化学镜框眼镜、清秀善良、文质彬彬的高年级女生（她的班级正是我的姐姐班）。我和宋彬彬没有过任何接触，即便在文革中，也从未有过她张扬狂热、盛气凌人的记忆。我相信，母校的同学多数会持有这个印象。”

我虽写过几篇文章谴责 8·5 暴力活动，但是从来没有把宋彬彬和校长之死看成因果关系，这是我一贯的立场。我公开为宋彬彬说话，希望本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原则，撇清宋彬彬身上的口水，给她一个面对自己和公众的空间。不说出施暴学生的名字，不等于可以嫁祸于宋彬彬。宋 8·18 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成为当时的公众人物或曰文革符号，不等于 8·5 事件的责任就应该归咎于她。既然 8·5 校长之死和 8·18 宋彬彬戴袖章已经成为标志性的公共事件，就不可能只有王友琴同学的一种版本，一个声音。当事人的声音绝对不应空缺。

我知道，公开为宋彬彬说话是一件冒险的事，事实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来许多谩骂和侮辱。政治挂帅者批我“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自恃高贵者讥我为“小可怜、小市民，拍干部子弟马屁”，聪明伶俐者骂我是“蠢妇、不要脸，是学校的耻上加耻”，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是怎么死的”（运动中自杀）。一时间在一些博客和实验中学的博客网站留言板上，骂我的声浪甚至超过了对宋彬彬的讨伐。文革初我十六岁，仅因为对个别干部子弟有意见，就被上纲为“仇视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批斗被孤立，临近六十岁时，因为反对妖魔化宋彬彬，又被斥“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这些未脱文革窠臼的霸道语言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非黑既白的绝对化思维如此根深蒂固，蛮横的姿态和狂暴的语言除了发泄愤怒，难道更能接近事实真相吗？

我决心弄清真相。2007 年岁末，我开始参与对母校文革初期的调查。我知道，只有心态平和、实事求是、多头调查、反复质疑（包括对自己），才可能找到真相。

## 二、关于个人记忆的可靠性

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在不断自我否定中确认了这一点。重要的是一经发现，就要及时纠正。

感谢刘双先生的批评。我在五人访谈中提到，大批军训的学生回校前，我在校园里看到宿舍楼前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以为对联是他的发明。查阅了北大学者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一书，证明刘双的记忆比我准确。同时我要感谢王容芬女士，她在新作《迫害何时到头》一文中，指出我在“访谈”里对林莽先生发难，把林先生讲的两次提审说成了一件事，把林先生记忆的深色裙子说成了花裙子。王容芬女士是我敬仰的思想先驱和无畏勇士，她的故事我只听过一遍就永生难忘，因此我理解她在新作中的愤怒。其实，我在《记忆的疮疤》中，已知的时间和人物的记忆错误也有三处。

个人记忆与事实真相不能等同。不说久远的过去，就是发生在眼前的事，不同境遇不同心情的人，记忆也会千差万别。作为女附中 1966 年在校生，我也有自己的伤痛和记忆。但是，伤痛是伤痛，记忆是记忆，伤痛不能保证记忆的完整和可靠。

近年就“八五事件”我曾接受过三次采访，都被问到“林莽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一律穿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我是否也见过？刘婷婷是否用穿翻毛牛皮军靴的脚踩了卞校长的头？我的回答是一致的：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刘婷婷做过什么。但是，当时正值伏天，是北京最热的时候，我校激进的学生都是女赤卫队员的打扮——把裤腿挽到了膝盖，连鞋都不穿。至于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箍更没看见，宋彬彬 8·18 给毛泽东戴的尚且是从红色横幅撕下的布条连夜赶制出的粗糙毛边黑字袖章，8·5

当天怎会有特殊工艺印制的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呢？

我在五人访谈中限于篇幅，没有引用王容芬女士的原文（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本文为再次表达我对林莽证言的质疑，先引用王文如下：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应为朱学西——编者）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犹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应为朱学西——编者）老师也还在世。

由于我在“访谈”中表示了对林莽的质疑，王容芬女士为此向2006年采访林先生的友人求证。她说：

林先生2008年又给王友琴女士讲了一遍，与2006年的讲述完全一致。这个证言两年前经我传出后，林先生受到许多恶言恶语，包括网上围攻。这位友人很悲愤，认为“历史的叙述变形了。大家可以说这段的真实细节，但不是这样的说法，这简直是不顾受难者的伤痛……他不计较卞当政的时候给自己划了极右，一家遭遇了人间惨剧，他仍然做电影里红卫兵暴行的证人，担当的已经够了……现在才跳出来写作的这一群，他们为的是与道义毫无关系的目的，我为她们羞耻。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

王容芬女士身居国外，亲自访问林莽不容易，无人会苛求。我倒要问问那位“友人”求真的精神在哪里？既然当事人是两位（林、朱），“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老也还在世”，去拜访过后者吗？搞清宋彬彬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的“深夜”，在什么地方、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难道就无所谓吗？“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至于这种视自己为道德化身的文学语言，除了矫情又有何用？

宋彬彬“提审”林、朱二位老师，应该不是心血来潮的孤立行动。我在《访谈》中披露了历史教员朱学西老师与林莽老师不同的记忆。林莽先生指认宋彬彬的证言，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为具体的文字，有细节、有过程、有后果，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唯一的遗憾是缺少时间和地点两个元素。前几天我仔细读了本人1967—1968年的日记（1966年日记缺失，但是也可以理出头绪），试图找到林老师被提审的那个“深夜”。

1966年6—8月的事在五人访谈中已有详细叙述，同年9月开始大串联，起初是有资格的极少数“红五类”，国庆节后很快就失控。女附中变成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附中”，校园里到处是穿着军装的青年男女，哈军工把我校作为“联络站”持续了几个月，而本校学生多去外地串联或呆在家里。1966年冬天，被“血统论”压制的学生强烈反弹，纷纷成立各种组织，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像8月中下旬突然出现一样，“老红卫兵”又突然消散了，其中的强硬分子组成“联动”，炮口直对中央文革小组。学校仍处无政府状态，但大食堂照样开伙，接待外地串联学生，负责后勤工作的是副校长李天义，因他是原从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没有受到大冲击。

1967年初开始军训，南口驻军装甲兵4636部队进驻学校，学生分裂成四三派（红色造反团，1967年2月22日成立）、四四派（东方红公社，具体成立时间不详），毛泽东

主义红卫兵作为第三方依然存在。年初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就是派性斗争、大联合、年末学校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局势稳定后，解放军撤离（1968年元旦过后，该部奉命开赴越南战场），但高团长等领导还在（是否“三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日记没有记载）。我在1967年11月25日（星期天）写到：“解放军撤走了，指导员在汽车上挥舞帽子与我们告别的情景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不少同学都哭了。”1967年秋冬，已有少数同学提前报名下乡，11月16日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为去内蒙插队的同学送行，12月9日去北京站为赴北大荒的同学送行。12月15日学校公布了首批毕业生分配方案，有19个同学将走上工作岗位。需要说明的是，四三派保校长胡志涛，四四派批校长胡志涛。整年没有针对校领导和老师的集中斗争。

1968年从1月4日开始写日记，几乎全是到西单食品商场、西城肉联厂、21路公共汽车等处劳动。1月14日记：“今天新生开家长会，我校招新生25班1000多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新生何时入校我没有记忆。因为女校对男生缺少管理经验，抽调在校66届学生做新生辅导员，近日我班一同学告诉我，她也当过辅导员。1968年整个春天都在整治学生，一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联动分子”，二是反对血统论同时无视新政权的四三派头头和骨干。与此同时，少量表现好、出身好的学生陆续去工厂报到，接着就是六六届学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我是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的，同行的是119名初三/高三同学。

刘进、宋彬彬1966年8月19日宣布退出学校“筹委会”后，据我和一些同学回忆，她们再没有担任过任何组织的头头而抛头露面，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她们的事。那么，宋彬彬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又在哪年的某个深夜提审了老师？据朱学西老师回忆，他被提审并屡遭男生暴打，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我认为这更合情理。我们到北大荒的头半年，陆续得知学校改名“150中学”，进来了工宣队，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几位老师先后自杀。宋彬彬比我们离校更早，由她提审老师，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

最后，我还要说到“绸衬衫”和不管什么颜色的裙子。自从1966年8、9月恐怖的“破四旧”运动以后到1968年6月我下乡北大荒，记忆里没有看见过哪个同学穿裙子，倘若有，一定会被讥笑为“小资产阶级”，那人肯定不会是“革命后代、共产党员”宋彬彬。70年代初期江青接见外宾，穿了一件仿唐装的连衣裙，我们看见报载后惊呼：哇！以后可以穿裙子啦！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到以上细节，只是为了说明：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记忆重复100次，仍旧不可靠。林莽老师勇敢地站出来作证，我对他表示敬佩，但是，我仍坚持对他某些说法的质疑，这不是人格否定，更不是继续“迫害”。质疑是对另一种可能的发现和探寻。在同一事件100个不同的记忆样本中，必定会找到相同性或相似性，那也许就离真相不远了。

### 三、为什么要“纠缠”于细节

任何事件都包含着时空两个方向，过程代表了时间，人物是空间活动的主体，而林林总总的因果关系让一个事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女附中的文革事件正是这样。

我第一次听说王友琴的名字是从初中同学叶维丽那里，大约十年前，我们谈论校长之死（多年来我们经常谈起的话题）时她说，咱们学校有个叫王友琴的同学，也写过文章，她比咱们小，可能是老初一的。多年来，王友琴一直是我敬重的校友。2007年我从实验中学网站的校友录里得知，王友琴是高一3班学生，原来是我们的学长。对她倾毕生精力搜集文革死难者资料的工作，她的超凡勇气和耐力，我要再次表示敬意。

我非常赞同王友琴学长的观点：“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复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舍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

几个月前我读了王友琴在1986年写的《女性的野蛮》，文章叙述了她的同学发动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作为在场者，她讲得有声有色，而且行文质朴。我不妨摘录几段：

1，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2，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3，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

4，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

那个高三学生，是王友琴文章中唯一明确的指向。我们一看就知道她叫刘进，而不叫宋彬彬。当时学校没有“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可能王友琴也不清楚，就笼统给了个称呼。

十几年后她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记忆，在著名的《卞仲耘之死》一文里，基本舍弃了旧的叙述，提出了新的逻辑链条，即红卫兵7月31日成立；8月5日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我相信这是王友琴学长经过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当年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战斗队曾编辑了一个“师大女附中文革大事记”，截止到当年10月。说到红卫兵时，原文是：7·31“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成立。这句话语焉不详，我们曾经很想访问那个组织的负责老师，因为这位老师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称完全记不起是谁做的“大事记”。我们在五人访谈中指出，7月31日反工作组的同学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前身叫“红旗”。成立宣言用红纸黑字张贴在大食堂附近的布告栏里。从《女性的野蛮》中得知，王友琴的那几个同班同学并不属于这个组织。而以血统论为标志的“红卫兵”，因至今没有找到公开宣示的证据，成立时间、斗争纲领、组织原则、人员组成更是一团乱麻，导致许多校友、老师，都没有界限清楚的记忆。

认定宋彬彬为8·5打死校长的红卫兵负责人，有一件关键物证，就是7人名单。名单来自于王晶尧先生，我们必须感谢王晶尧先生悉心保管至今，使一张纸片成为有力的物证。刘双先生说，五一那天他打电话再次向王晶尧先生求证：“他说那字条不是医院转给他的，是他要求7人写的。这里没有因年老记忆不好的问题，因为10年，20年前，30年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问是谁的笔迹，他说是刘进的笔迹。但是，李松文承认是自己的笔迹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李松文亲口讲的，是转述。可信度有多大？看来要验笔迹或测谎啦。”（见《记忆》48期编读往来·刘双来信）其实要确定是否李松文笔迹，当面去问他即可，比验笔迹和测谎容易得多，几乎没有成本。

2008年初，这个纸片在几个博客里反复张贴，有人说凶手就在里面！我看到后，第一反应就是李松文老师写的，他教我们初三几何，天天在黑板上画图、板书，字体流利而内敛，很像老实厚道的老师本人。我的同班同学看了47期《记忆》，也有几个电话里说，那名单一看就是李松文写的。在这里，我要特别表达对李松文老师的敬意，行事风格谨慎质朴的李老师，在当年和现在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名单竖着写，我们是从右向左看的，而王友琴学长是从左向右看的，得出的结论当然相反。老师和在场学生为医院抢救“黑帮”做担保，和家属“要求女附中权力当局留下姓名”完全是两回事，这里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记忆，我认为也很正常。签名透露的信息，不仅否定了王友琴学长关于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的判定，还提示了工作组撤走后“学生代表会”的现状，七人中第一个是老师，第二、三、四、五个是在医院抢救现场的学生，第六、第七是“学生代表会”成员刘进、宋彬彬，她们在名单里的位置，正说明是以个人名义而非“组织名义”出面。

有批评者认为，我们的“访谈”是在否定“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王友琴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对王友琴“鸡蛋里挑骨头”。我不禁想问：谁有权利垄断对历史的解释呢？我本人很好奇王友琴多年来如何对8·5事件研究出了现在的结果。这个结果虽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让她远离了事件本身，远离了真实的自己。至于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信了王友琴提供的版本，责任不在王友琴，而在我们：当年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化的我们。

有批评者认为，纠缠于8月5日有没有红卫兵，否认8·5事件的组织者和施暴者当时是以红卫兵身份出现，本质上是在为红卫兵辩护，是在为宋彬彬脱罪。放眼于文革这一空前浩劫，笼统地指控红卫兵，谁也不会持异议。我在“访谈”里也说过——对于我来说，红卫兵就是干部子弟的别名。但是，“卞仲耘之死”既然成为文革暴力的“样本”，又牵扯到另一标志性人物宋彬彬，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是不容回避的责任。只有厘清一个个“个案”，才有大历史宏观的叙述。

还有批评者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权力真空”，8·18之前，权力掌握在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手中。我们对母校文革初期“权力真空”的时间边际，认定为工作组撤离后的一周。胡志涛校长在她的《生活教育论》一书139页第三自然段里写到：1966年8月5日，我起个大早。“找市委去！”思索了半夜的一个念头驱使我向市委走去。脑子里的一大串问号都想到市委能得到回答，特别是昨天出现的打人现象。我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我向他陈述了工作组进校以来的情况，七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的混乱状态，我特别强调了昨天的打人问题，我说：“这说明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请指示，我们该怎么办？”他听后却用平静的口气劝说道：“你回学校去吧！”我站着没动。这时，我多么希望他能说出一句：“你们回避一下吧，先不要到学校去了。”他站起来看我不走，又补充了一句：“回去吧！我们会向区委通报的。”我怀着沉重而失望的心情，走出市委大门。一路上，脑子里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回去！回去！明知是凶多吉少。但我是校长，我是一个长期受党教育的共产党员。上级指示，我只有服从。无论如何，我得硬着头皮回去。

我们在访谈中谈到的每个细节，时间、地点、人物都经过多方调查和反复求证，限于篇幅不得不几次压缩，诚如郭建先生所言“经过作者精心选择”，若郭先生发现哪个细节“似是而非”，欢迎指正。

最后，我个人认为8·5事件中，作为工作组时期的骨干，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年级学生，刘进、宋彬彬有她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导致校长死亡的直接责任或间接责任，而是道义责任。事实上，8·5那天她们已经承担了这个责任，两度去劝阻，将校长送至医院，连夜向市委汇报，8·6早上向全校通报。校长之死，不是当年的她们和老师学生们能够预见到的，因而苛求她们并无道理。

为了厘清母校那段文革历史，当年的学生会主席，而今年过花甲患有冠心病的刘进辛苦奔波了几年，访问了几十位老师、校友，写下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包括100多个注释），交给学校存档。可以说，她把责任一直承担到了今天。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些殴打、羞辱过老师的同学，我仍然希望她们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给当代一个解释，给后代一个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锅，不等于自己就可以永远隐藏在历史的汪洋里。我想起制造了“宋要武”的光明日报记者，利用了“宋要武”的湖北省委喉舌《长江日报》，如果相关的当事人还健在，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还历史一个公道。宋彬彬改名宋岩的档案应该还存放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有查阅权限者，也可以作证宋彬彬是否改名宋要武。其实，文革中改名卫东、忠东、红卫、爱党的不计其数，改名本是寻常事，惟有“宋要武”叫不得。

2008年1月24日，叶维丽、于羚和我第一次约刘进、宋彬彬谈她们文革初期的经历，那天谈了6个小时。一周后，再次对她俩进行访谈，从上午十点谈到晚上九点。二年多以来，我们就同一主题进行过十多次谈话。宋彬彬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她诚实、诚恳、善良，并有着她那个年纪少有的单纯。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无法了解她的内心经受着怎样的煎熬，但我知道她很冤——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出来为她讲话的原因。

2010-05-17

□ 原载《记忆》第49期

~~~~~  
【自由论坛】

从冯敬兰的有罪无罪标准看她为宋彬彬所做的辩护

• 看好戏 •

冯敬兰最近的一系列文章和采访，都有一个主题，就是为文革中的罪犯张目。最近的这篇《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更是明确说出了为什么要为这些人说话的理由。

一方面，我支持冯敬兰探讨这个话题，因为只有反复讨论，才能让这种可怕的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但另一方面，我发现冯敬兰也许因为自己是从文革这样把杀人当家常便饭的年代过来的人，所以她对谁是罪犯的标准和正常社会中成长的人的标准相去甚远。更为严重的是，她自己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点，这才是最可怕的。我想，正是因为冯敬兰，还有叶维丽等人对罪犯的基本标准和正常社会中人的标准差别很大，才会让她们居然理直气壮地为文革罪犯们辩护起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实。中国有不少人和冯敬兰、叶维丽等人想法类似，她们否定文革，却不否定造成文革的根本原因。她们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否定杀害卞仲耘是革命行动，却不认为杀阶级敌人的所谓革命行动就是犯罪。我想，正是下意识的这种不把杀害无辜看成是犯罪行为的革命思想，使得她们在为宋彬彬，刘进等对杀害卞仲耘负有责任之人辩护时，丝毫不觉得有半点羞愧之心。

卞仲耘一案因为中国不鼓励对文革的研究，也因为当年亲眼所见的人们不愿说出她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很难在现阶段就卞仲耘一案中宋彬彬所负的责任和冯敬兰、叶维丽一件一件事情用证据来辩论。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冯敬兰自己所透露出来的其他事情，以及她对这样的事情的态度，看到冯敬兰等人所持的立场有多么荒谬。

我们来看看冯敬兰自己所写的这样一件事情：

“我先讲一个与此无关的故事。前不久，我的一个好友和我谈到校长之死的争论时，讲了

自己的亲身经历。文革时朋友正读高一，班里一个产业工人的女儿，平时不起眼，突然成为斗争老师殴打同学的急先锋，她在对女班主任毒打之后，把一壶开水浇到了老师的下身。严重烫伤、感染、溃烂，在66年夏天给老师带来了巨大痛苦，并造成严重残疾。文革结束后，朋友所在的部门接到一封检举信，告发的正是那个女生。朋友把信锁在抽屉里，内心挣扎了许久，终于决定不转给她的单位。朋友说，如果我把信转过去，她的一生可能因此就毁掉，这将造成我终生的不安。老师既然没有告发她，就应该给她反省的机会和时间。现在，那个女生已经退休，她也是老师，工作干得不错。朋友说，我认为我做得对。”（“为什么不说出卞仲耘案凶手的名字？”见本刊zk1005d——编者）

冯敬兰讲的是她朋友遇到的事情，但很显然，冯敬兰是非常支持她朋友所做的事情的。冯敬兰对她这位朋友的支持，反映了冯敬兰自己对于什么是有罪什么是无罪的基本判断。

我们生活在正常社会里的人都知道，用开水烫伤老师下身使得老师成为残废是公诉罪，不是受害者不告，检察院就不起诉的。就好象杀人罪一样，一个人杀了人，即使被杀之人的家属不去告杀人犯，公安机关也必须抓获罪犯，检察院也必须起诉，法院也必须审理。这也和强奸罪一样，一个男人强奸了一个女人，即使女人不去告发男人，公安局也必须抓获罪犯，检察院也必须起诉，法院也必须审理。冯敬兰的这位朋友犯下了妨碍司法罪和包庇罪，是极其严重的罪行，可是冯敬兰居然这么欣赏她这位朋友的犯罪行为。在有这样不正常的有罪无罪观念的冯敬兰眼里，宋彬彬当然是无罪的。但是，这样的人为宋彬彬所做的任何辩护不可能为任何正常社会里的正常人所接受。

虽然冯敬兰年纪比我大很多，但对于她这样一个成长在人类基本是非标准都被颠倒的年代里的人，我觉得还是要教她一些人类共同的基本常识和准则：

一个女学生用开水烫伤老师犯下的是刑事罪，任何一个守法公民应该积极配合执法部门将此罪犯逮捕归案，接受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你的朋友接到一个守法公民履行自己基本的公民义务而写的检举信后，非但不把此信马上交给执法部门，还私自扣押下来，让罪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让守法公民的守法行为得不到鼓励，让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这是极为严重的犯罪行为，本身就是应该被逮捕审判接受法律制裁的。你非但不谴责你朋友的非法行为，还公开为你朋友的行为叫好。你的这种做法虽然没有触犯法律，但却是我们每一个守法公民都要谴责的。

~~~~~

## 【拷问历史】

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

• 叶志江 •

历史是由一连串的故事连接起来的。叶维丽说，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见《记忆》第47期，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一文），譬如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好故事，但演义并非历史。

叶维丽的文章虽然涉及的只是卞仲耘之死这一个案和宋彬彬究竟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但它触及了文革史之所以扑朔迷离，讳莫如深的大问题。

文革十年，青年学生担任主要演员的是头两年，写文革史，最难落笔的恰恰是这两年。不要说整个历史，就是这两年中发生的许多故事恐怕都是很难讲得清楚的。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

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卞仲耘之死便有它的难言之处。

周作人在《故事难讲》中引用过一件轶事：

英国洛利勋爵在狱中写《世界通史》，有一天看见窗外有人斗殴，甲打一个像是官吏的乙，乙立即抽剑刺甲，甲以棍殴乙，遂同倒地上。次日有友来访，洛利告以所见。友订正之曰：乙非官吏而是西班牙使馆的仆人，是乙先打甲，并未拔剑，乃是甲抢去把乙刺死的。洛利不服，说亲见无误，友人说那时自己在场，为了夺取凶手的剑，额上还受了微伤。洛利于客去后尽焚其稿，因为目睹尚难尽信，过去的事更无从说起了。

卞仲耘之死已是四十多年的事，现在要讲清楚自然很难，更何况一些当事人选择沉默。甲乙两人打架，事隔一天，目击者洛利和在现场的友人的说法便有矛盾。殴打卞仲耘时在场的人不少，总有上百人吧，四十多年后各自的回忆不可避免地有冲突之处。

有一点倒是比较清楚的，宋彬彬曾出现在殴打卞仲耘的现场，但未动手，也未动脚。这是各方证人都确认的。卞仲耘之死，宋彬彬无直接责任。因此，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从1978年至1989年多次向法院状告袁淑娥等有关人员时，宋彬彬并未列为被告人。但王晶尧认为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十多年前，王友琴首次向公众揭示卞仲耘之死时，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

文革史和文革中的故事之所以“难言”，除了时间“久远”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不可推卸的责任”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它涉及错综复杂的文革大背景。极而言之，有人甚至认为文革中出现种种非人性的行为，人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叶维丽，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教授。早年同宋彬彬、邓榕和王友琴等名人一起就读于京城著名的皇家学校——卞仲耘任副校长的北师大女附中。因此，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初和随之而起的“红色恐怖”发生时，她正处于漩涡的中心，对文革有过直接的观察和鲜明的记忆。应当说，作为历史学家和得益于美国“语境”的宽松，她的文章要比一些洋学者、囿于国内政治束缚的大陆学者和未经历过文革的研究者，更能搔到历史的“痒处”。她的文笔和层层剥茧式的分析也让人对四十年前的那场革命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她看来，对卞仲耘之死无直接责任、甚至在现场作过无力的劝说和努力的宋彬彬却成为“千夫所指”，有关她和卞仲耘之死的故事在网上流传了几十年，长盛不衰，并成为许多文革史的研究者，特别是国外的学者研究文革的重要依据，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注意的有趣现象。

在《卞仲耘之死》（署名白芳）、《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和她那本《动荡的青春》等文章和专著中，她试图通过对文革爆发后最“激动人心”的几个月的历史进行梳理和研究，为宋彬彬，实际上更为红色大院里的儿女们在文革初期的行为进行辩解。

在叶维丽发表的这些文章里，她在剥离宋彬彬对于卞仲耘之死有直接责任这一点上是很成功的，澄清了不少疑问。

如果在红色恐怖中死去的仅仅是卞仲耘一个人，我想，叶维丽几乎已经成功了，除了她无法否认宋彬彬等人写的大字报对卞仲耘遭受迫害所产生的影响。

问题是卞仲耘之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作为历史学家和曾经的红卫兵，她并不讳言以

干部子女为首的中学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仅在北京市便夺去了一千多个平民百姓的生命，其中不少是中学校长和教师，卞仲耘之死的重要意义在于她是第一个牺牲者，又恰好是那个“贵族学校”的校长。

每一个死者都有“我虽死去”的故事，这一千多个生命也各自都有直接的责任者，但这近乎屠杀的悲剧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一定有人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谁之责？叶维丽说：“哈里斯先生不满意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我也不满意。”因此，作为历史学家，她难以否认以干部子女为首的中学红卫兵，特别是其头面人物在推动“红色恐怖”中所扮演的角色。当年的中学红卫兵绝非只是乌合之众，没有像样的领袖人物。1966年8月24日，当几千名中学红卫兵有组织地“血洗清华园”时，那是何等地纪律严明和具有战斗力呵。没有统一的指挥，行吗？

那一段历史的难言之隐并不仅仅是“卞仲耘之死”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而是在文革后，当许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大学生红卫兵领袖走进大牢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学红卫兵领袖为66年夏天的那场屠杀承担任何“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千多个生命被“宜粗不宜细”掉了，或者如北师大女附中另一个红卫兵领袖刘进在宣布卞仲耘死亡一事时说的那样：死了就死了。

人们理所当然地怀疑这和中学红卫兵领袖的家庭背景有关。

几十年后出现在网上对宋彬彬等人的道德拷问或追索是那段难言的历史的一种回响。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确有它的偶然性甚至有点委屈。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并被赐名“要武”后，那张光辉的照片让她成了红卫兵明星，日后却让她为卞仲耘之死背上了十字架。

叶维丽曾引用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话说：What comes after cannot influence what came before，意思是说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倒过来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是的，8月18日发生的事不能用来说明卞仲耘在8月5日被打死的事，但作为中学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她的“革命历程”同66年的红色恐怖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

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恐怕并不完全在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上所负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彬彬或宋要武已成为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政治符号，就像蒯大富成为红卫兵运动后期的政治符号一样。蒯大富已用十七年的牢狱生涯来偿还他的债务，宋彬彬等人又该如何偿还他们的债务呢。

叶维丽说：“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们都已鬓发灰白，夜深人静时，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就像当时选择怎么做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大脑一样，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个人的。”

或许只能如此了，阿门！

□ 原载叶志江博客（2010—05—25）

~~~~~

【往事追忆】

一则“比赛杀人”传言的辨正

• 方影竹 •

中共建政后，高官们为保证他们子女成龙成凤，各系统纷纷办了特殊化的子弟学校。如北京的景山小学、育英学校，是中央级的子弟学校，刘少奇的孩子就在那里上学。华北军区办的八一学校，占用了海淀一所清朝王府故址，曲水亭榭，人间仙境，文革时北京人才有幸一饱眼福。另有一所中央军委办的干部子弟学校，以纪念国庆为由，起名“十一小学”，后增办初中，更名为“十一学校”。我于1962年8月以现役军人身分调入当教师，随后转业。我按部就班教书四年后，遇到文革，“停课闹革命”。我身处动乱中心（北京）的中心（“联动”巢穴之一），经历难得。

1995年来纽约，64岁的我，追忆文革期间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往事，写下我站在十一学校办公楼前，同一个男生的谈话情景。下面是原文：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没有。我当兵之后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15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根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象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后来便住在那里。有教堂里储存的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后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

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某某等几个女生。宋某某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成为“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

这段话是我以万英树为笔名写的《“太子党”的青少年时代》的一小段。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1996年2月号（总第33期）第16页至第18页上（读者可以从《北京之春》网站搜索出来）。过了两、三年，我的这篇文章在《东西南北》网上出现，题目变为《太子太傅谈“太子党”的青少年时代》，署名、出处全无。当时心想，说人家是太子，我自然是太子太傅。只是太子太傅拿三千石粮食，官至从一品，我呢，吃粉笔面的教书匠而已。

不料过了几年，又出事了。

我的这段话被单独拿出来，流传网上。有两个字被更动，但那是极为要害的两个字，即把我写的“宋某某”变成“宋彬彬”。又进一步见到网文，提到已故经济学家千家驹的《自撰年谱》里记载着宋彬彬比赛杀人，她为了胜过别人，打死了八个人。

为了找到《自撰年谱》一阅，我先在我住的纽约皇后区大书店和图书馆查找未果，便冒了少见的冬日雷雨，到曼哈顿纽约市立图书馆找。该馆亚洲部的钟女士作了全球联网搜索，查到一本，但保存于香港大学！我又从一家港刊上知道，《自撰年谱》非公开发行，而是作者自印，赠送少数朋友的，我只得放弃查找。

其实，细心的读者，是不会把张三的帽子给李四戴的。十一学校只有初中，男女合班。宋

彬彬当时是北师大女附中高三学生，年龄也自然比我提到的女孩子大三岁。此宋非彼宋，是很明白的。

有人会问：“你说的是事实吗？”告诉你：均为事实。当时我和那个男生站立的位置，他的神情，至今记忆清晰。至于我提到的宋某某，她的名字，我记忆得很准确。我当时是在内心震动中接受信息的，怎能忘记？我现在再补充这个男生当时说的两个情节：

第一、他告诉我：红卫兵打人的器械除皮鞭外，还有截断的自行车链条，以及木棒。有一个老妇被红卫兵推倒前，不哭喊，不抵抗，口中缓慢地说：“你们打死我吧。”一棒子下去，她的臂骨断了，慢慢蜷曲，就象烧烤猪腿一样。

这段话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只是此刻打字时手在哆嗦……。

第二、他还告诉我：带来的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狗崽子，也被打死。他问我，“她这么小，怎么也是资产阶级？”我这个当老师的太不称职，当时什么也答不出来。

有人会说：你十年前发表文章时，把“宋某某”的名字写出来就好了。这话有理。此刻行文，吐露她的真名，也能去除读者悬念。但说还是不说，这是问题。思之再三，不说为宜。她，今年该是五十七、八岁的母亲或祖母了，由她自己反省和处理吧！

我现在倒是想对宋彬彬说几句话。

我是倚着十一学校喷水池铁围栏，从广播喇叭中听到天安门城楼现场报道，知道你同毛泽东对话内容的。“要武嘛！”在当时可是最高指示，是要照办的呀！其罪恶影响，不可估量。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各有各的帐。我当时不是你那个学校的老师，你是否打过人，用什么方法打人，在什么地方，发出过什么“勒令”，参加过什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一无所知。美国之音就你“不提、不辩、不道歉”的态度发表的评论（今年第一期V O A《对比新闻》节目），值得你深思：“如果她相信中国人已经把过去遗忘了，那她就错了。人们看到了她写的文字，这些文字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很多人对宋彬彬吹嘘她在美国的成功，同时只字不提她在高中时的举动感到愤慨。人们称她是母校的耻辱，说北师大女附中90年校庆是一个无耻的校庆。”知耻近乎勇。60岁的人，面对一个专制腐败而不作反省的出生国，什么是应有的晚节，你应该作出一个不再令人失望的回答。

□ 原载《民主论坛》

~~~~~

#### 【文献资料】

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 宋要武 •

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了我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心里激动极了。当时，我向主持大会的一位同志要求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以表达全体“红卫兵”战士对毛主席的无限信仰，无限热爱。他把我带到了主席跟前。我满怀激情，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我们伟大领袖的臂上。

毛主席高大魁梧，红光满面，身穿一套绿军装，戴着一顶绿军帽，鲜艳的红领章红到了人

的心坎上。看见主席这么健壮，我心中感到有说不出的幸福，真想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

回来后，我心中一直平静不下来，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主席的要求差得太远了，给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干的并不好，却见了毛主席。我能亲手给他老人家戴上了红袖章，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也感到十分惭愧，但我干革命的决心也因此更足更足了。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要武，要闹，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前，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就是跟着毛主席，紧握枪杆子，闯江山，打天下，用革命的暴力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这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要武嘛”，这个真理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这个真理对中国适用，对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也都适用。

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向革命前辈学习，也要武。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接见百万群众，这也就是要武的精神。毛主席向来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就是要我们发扬敢闯、敢干的革命造反精神。过去，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紧紧地束缚着我们，想把我们革命的棱角都磨光磨圆，把我们磨成不敢造反的文质彬彬的书呆子。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的小将在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从这三个字里，我们看出了毛主席对革命的下一代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请您放心吧！我们是革命的后来人，我们要做旧世界的叛逆者。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革命。我们要冲破一切束缚，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把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个稀巴烂。

我们知道，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在前进的路上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为了毛主席，为了革命，刀山火海我敢上，惊涛骇浪我敢闯。只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发扬“武”的精神，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斗争中成长。革命的重担我们要挑，革命的大权我们要掌。我们向毛主席保证：资本主义休想在中国复辟。我们不但要让中国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不变色，而且让它在我们下一代手中也不变色，让它千秋万代红下去，要让红光照遍全世界。

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发扬“武”的精神，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宋要武（宋彬彬）

□ 原载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光明日报》，二十一日转载于《人民日报》

~~~~~

【史海钩沉】

北大附中“文革”初期记事

• 陈 兵 •

学校，神圣纯洁的知识殿堂。校园，美丽欢乐的知识乐园。看到天真无邪的小学生、渴望知识的中学生、胸怀大志的大学生在校园里孜孜不倦的努力，为实现宏伟的理想而奋斗，真真感到了宽慰。可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六年后半年，那触目惊心的校园三月，共和国十年的厄运从此开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笔者用文字将它记载下来，以示后人：科学、文明、民主是我们不懈的追求，愚昧、邪恶、落后只会带来灾难。

一、疯狂的六月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全国著名高等学府的附中，位于海淀区中关村附近。六十年代，它的周围是大片的农田，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校园里矗立着高中、初中、学生宿舍三座大楼，篮球场、足球场、大礼堂、图书室，是当时北京众多中学校中上乘的。中关村是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的所在地，北大附中的很多学生就是这些研究所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国家部委、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子女也慕名考入这所中学。甚至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美国黑人领袖的儿子及来自五大洲一些国家在华工作专家的子女都在此学习，这在当时北京中学里是独一无二的。学校学风严谨，制度严格，校园里鲜花绿草，欢歌笑语，朝气蓬勃，令人向往。

但是，善良的人们，天真的学生们，谁能想到，一股黑色的疯狂在悄悄地袭来，这座圣洁的殿堂将被砍的七零八碎，倒在血泊中呻吟。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从附中的上级单位北京大学传来消息：一张揭发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引起了轩然大波，内部说就像一九五六年右派攻击共产党的大字报，后来才知是聂元梓等人贴的，成了十年浩劫的导火线，但当时很少人知道聂氏为何人。学生中特别是高中生在悄悄议论，校党支部赶紧做工作，要学生们安心学习，不要受北大事件的影响。

六月二日清晨，当学生们进入教室上课时，从高中教学楼传来了学生的叫喊声，校园不得安宁了。正当不知何因时，教室里的小喇叭响了，传来校党支部书记刘美德颤抖的声音：“同学们，昨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的大字报，今天不上课了，大家可以到北大看大字报，对校党支部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写大字报。”

一时学校大乱了。各班都贴出了揭发本班班主任或各科老师的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什么在课堂上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啦、穿衣发型特别啦、家庭出身不好啦、乱搞男女关系啦等等，甚至名字也成了揭发的材料。如“刘美德”被说成崇拜美国的品德，“贾世起”就是假的世界起义，不让世界人民起来革命等等，令人啼笑皆非。学生说话语气也变了，平时温文尔雅的学生几天内就学会“他妈的”骂人了，好象这样才革命。这也难怪，当时学生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思想简单，思维方式也简单。

这时，出现了一个名为“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组织，（以下简称“红旗小组”或“红旗”）贴出了揭发校党支部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的最高领导，一看就有来头。这个组织吸收的人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当时就这么叫）、革命烈士或血统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只要所谓出身好就可以加入，表现好不好无所谓，以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打、砸、抢的暴徒和社会渣滓。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的父母大都是当时国家党、政、军较上层的领导人，处于位高权重的位置，所以他们知道的内部消息很多，当人们还未搞清“文革”为何物时，他们就打听到下步运动的步骤了，斗争的方向自然是正确的。这样“红旗小组”随着运动的发展变得越发有名，成为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齐名的全国中学生“文革”初期造反组织的先驱，受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肯定，在“文革”史上也留下重重的一笔。在此

不妨把他们的主要核心人物简介一下：牛晓平，男，高三学生，平时没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特长值得别人注意，“文革”一来拉起队伍造了反才被人所认识。宫小吉，男，初三学生，“文革”前有些名气，主要是他在当时全国发行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换得五分的秘诀》，痛斥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学生，讽刺为学好文化知识而刻苦学习的学生，赢得了一些平时学习成绩差、家庭有些背景人的赞扬，也符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得到一些上层人物的肯定。彭小蒙，女，高一学生，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可“文革”开始立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了造反先锋不说，还在天安门上对着百万人讲话，毛泽东就站在她身边看她讲，还与她在下面谈了二十多分钟话，这使她瞬间身价百倍，成为全国著名人物及全国中学生的崇拜者。

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学校领导机构一下被冲垮了，“红旗小组”逐渐成了校园主宰。昔日的师道尊严威风扫地，学生开始发号司令。“红旗小组”控制了学校的广播站，通过高音喇叭命令老师们打扫厕所、楼道、校园。老师们哪敢惹“革命小将”，立即出来干活，正值吃饭时候，学生们端着饭盆，吃着饭看热闹，有的还把饭盆敲的叮当乱响，漫骂取笑着老师。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历史跟人们开了个大玩笑，叫今天的学生们听起来不可思议。

这样乱下去总不行，党中央（二十多年后才知道这个党中央是刘少奇为首的，毛泽东在外地静观形势发展）决定向各校派驻工作组维持秩序。北大附中和北大同时进驻了工作组替代了原校领导。工作组进校后很快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工作组领导人、出身好的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前面说的“红旗小组”头面人物牛、宫、彭名列其中。昔日毫不显山露水的小人物终于借动乱之机爬进领导阶层，实现了昙花一现的当官欲望。

于是，情况稍有安定，工作组召开了几次全校师生大会，组织学习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各班继续写大字报揭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其追随者。昔日干净整洁的教学楼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塞满，一片狼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师被点名批判，几乎每个老师都有罪行，现在想起来真可笑，新中国出了那么多罪人，国家不早就玩儿完了吗？那时人们怎么就那么幼稚愚昧呢？

但是，就这种形势也没维持多长时日。“红旗小组”的头面人物又从上头得到消息：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错误，当然，一般人是听不到的。于是“红旗”又要捞稻草了，他们开始找工作组的茬。散布什么“工作组不斗走资派啦”“工作组排斥革命组织啦”“工作组是运动的绊脚石啦”等等，双方矛盾露出端倪。消息传出，一般学生对“红旗”不满，认为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纷纷贴大字报斥责。一位名叫沉默的初二学生写道：谁反对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就小心他的臭狗头！言辞激烈，实际是发泄对“红旗”的不满，可这位幼稚的学生哪里知道工作组根本不是毛主席派的，而“红旗”早从上层得到了消息。就是这句话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把沉默同学置于死地。

六月的疯狂在六月三十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生日的晚会上达到高潮。操场上坐满全校师生，利用面对操场的锅炉房平顶房顶做舞台，“红旗小组”借歌颂共产党的机会，喧嚣了自己的声威，同时也发泄了对工作组、对与他们有意见分歧学生的愤恨，风靡一时的《造反歌》就是在这天出笼的，它的词曲作者都是“红旗小组”的成员。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声嘶力竭，杀气腾腾，此首歌很快传遍了全中国，成了“文革”初期最流行的歌曲。到处杀声震天，人们唱着它失去了理智，象得了神经病，疯狂起来了，解放不到二十年的新中国滚进了动乱的旋涡。

二、分裂的七月

七月流火，大火升腾，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红旗小组”凭借内部消息造了校领导的反，也造了工作组的反，双方矛盾日趋激化。说实在的，工作组从进校开始就没慢怠“红旗”，“红旗”的头面人物凭着自己高贵的血统没把工作组放在眼里，工作组也尽量叫他们满意，一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就把他们拉进去，在全校师生面前一一介绍他们，使这些原来学校中的无名之辈出尽了风头。后来这些人反工作组，只不过是经某些上层人物的暗示，被当枪用罢了。可怜的倒是工作组，灰溜溜地撤走了，学校大权落到了“红旗”手里。

“红旗”一掌权，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以家庭出身划线，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学生，也就是所谓的“红五类”出身的都是好人，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的学生统统是坏人，拼命鼓吹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心谬论，并以这个标准贯彻所谓“党的阶级路线”，在全校形成学生斗学生、学生打学生的混乱局面，学生之间的分裂从此开始了。至今，虽已过三十多年了，但当时形成的裂痕也没完全弥合，造成了一代人的创伤。在此笔者以一个初中班为例，揭示当时的一些情景。

初二（五）班，一直是个优秀班集体，四十多学生中近一半是“红五类”出身，其中有国家部长、军队将军的子女，剩下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有著名作家、画家、科学家、普通职员子女，当然也有出身不好的，像摘帽右派、历史反革命等出身的。以前大家对此不太在意，团结融洽，选班队干部也不以出身做唯一标准，甚至出身反革命家庭的学生也当上了班干部，出身高官的人因道德、学习不好，能力不强也不被大家拥戴。这本是正常现象，无可非议，本来嘛，出身不由己，表现在自己。可在贯彻“阶级路线”时，上述情况就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表现，是校领导、班主任的罪状，是压制“红五类”子女的根据。

一天，“红旗”总部召集大会，班里“红旗”成员全去了，回来后，个个脸色变了，话声硬了，见到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绷紧脸，实在过不去的尴尬笑一声，象是演戏。原来，他们开会部署在各班打击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一位“红旗”头面人物在会上进行“动员”，大意是：过去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重用的都是学习好，但出身不好的人，班干部都是他们当，我们不少工农革干子弟因学习差被小瞧，现在我们要翻身！出身好的要团结起来，与出身不好的做斗争，揭发他们的罪行云云。

于是，学生斗学生掀起了高潮。初二（五）班“红旗小组”的成员组织召开全班学生会，名为“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揭发批判非‘红五类’出身学生的罪行”。首先矛头对准班长许国庆，他的父亲是三十年代著名剧作家许幸之，曾与聂耳创作歌曲《铁蹄下的歌女》，“文革”开始被当作黑线人物揪出。班里“红旗”的头头凶狠地呵斥许国庆：“许国庆，你这个‘黑帮’子弟，当班长时和班主任一起打击出身好的班干部，散布他们的坏话，罪恶滔天！今天你要老实交代是如何迫害工农革干子弟的！”许答：“我从来没歧视出身好的同学，你们不要无中生有！”“红旗”中有人喊：“许国庆，你态度不老实就等着瞧吧！”还有一位秀丽的女同学叫彭小清，其父是从美国回来的高级火箭技术专家，为七机部一研究所所长，后在“文革”武斗中惨死。只因其父是美国回来的，彭被当作资产阶级臭小姐批判。只抓住其在一次吃饭时见一革干子弟将菜与粥和在一起吃，无意说了句：“这样把菜和粥拌起来象农村喂猪的食一样。”这成了她的罪状。一位“红旗”的人拍着课桌吼道：“彭小清，你这个资产阶级臭小姐胆敢骂革干子弟吃的是猪食，对无产阶级这么仇恨！不对你们这些人专政，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就翻不了身！”彭辩解道：“我说那话不是那意思，更不是骂出身好的同学，你们怎能断章取义呢？”立刻遭到“红旗”一些

人的凶狠驳斥：“彭小清态度不老实，资产阶级狗崽子想变天！”因此，彭在八月的恐怖中几乎被打死，这在下文中将提到。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点名揭发批判，家庭出身成了辨别好人与坏人的唯一标准。这样以出身划线的学生之间争斗在每个班展开，校园里又贴满了揭批出身不好学生罪状的大字报。一位叫朱同的高中学生，其父是著名大右派葛佩奇，（朱为与父亲划清界限，故姓其母朱姓，葛佩奇后经胡耀邦同志批准平反。）出身坏，又对“红旗”不满，遭重点批判，被贴大字报数量最多。

学生之间的斗争如此激烈，再说一下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情况。学校最高领导刘美德被认为是北大校长陆平的红人，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早被“红旗”监禁起来。其他领导及员工也按出身划线，接受批判。由于“红旗”忙着斗学生，对他们多少放松了一些。

什么是当时“党的阶级路线”，据说是这样的：重视家庭出身，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而“红旗”他们却把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奉若神明，继承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糟粕，充当了封建阶级的卫道士。更可笑的是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一些人的父母也被揪成了“黑帮”“叛徒”，自己瞬间由“好汉”变成了“混蛋”，竟不知如何解释了。

三、恐怖的八月

如果说七月是精神的较量，那么八月就是肉体上的迫害。一九六六年八月，可以说是“文革”十年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之一。

北京海淀区二里沟的一条铁路，由于靠近城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钻火车自杀的人，血肉横飞，尸分数段，惨不忍睹。

什刹海、紫竹院、玉渊潭等水域，投水自杀者接二连三，尸首暴尸岸边。

以上还是自寻短见的，被无辜活活打死的更不计其数。

北大附中校园的八月，恐怖也令人心悸。

自“红旗小组”掌权以后，其头面人物洋洋自得，不可一世。特别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表示了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及彭小蒙的支持，更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在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了红卫兵，听了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广场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的讲话。北京师大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他献红卫兵袖章时，毛主席问她的名字，当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时，随口说了句“要武嘛”。伟大领袖的一句话被红卫兵们理解要用武力进行“文化革命”。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文斗升级到武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应立起四个新。许多珍贵文物被红卫兵毁于一旦，打、砸、抢、抄成了时髦，中国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的浩劫。

“红旗”自然又是急先锋。他们个个穿上父母替换下的旧军装，扎上宽皮带，好象只有这样才能继承先辈的传统。彭小蒙带头到社会上去抄家，抄得大量现金、黄金、衣物。宫小吉还怀抱一大地球仪，瞪大眼睛，伸长舌头照了张像片，好象当年希特勒，想一口吞并全世界。

在校园里，“红旗”组织了“打狗队”，就是用武力打击“狗崽子”，当时他们把出身不好的学生称为“狗崽子”。“打狗队”成员由“红旗”中一些痞子组成，只见他们穿着旧军装，握着带铜头的宽皮带，气势汹汹，嗷啊乱吼地在校园里横冲直闯，后来便挨班毒打出身不好的学生，

现仍以初二（五）班为例。

初二（五）班有一学生叫邹X X，是上初二时从天津转学到北大附中的，其父由天津调京任国家某部副部长。邹刚调来时，满嘴天津口音，逗得大家直乐，从此他象个大姑娘，说话腼腆，性格内向。谁也没想到在恐怖八月里他充当打人元凶，狰狞的面目暴露无疑。

一天，班里“红旗”组织通知全班人一个不拉到教室开会。当人到齐，邹X X带着几个打手，手提宽皮带，气势汹汹进了教室。课桌已摆放靠墙，中间留出一片空地，放了一把椅子。邹凶恶地叫嚷：“许国庆，过来！”许过去，邹一把把他按在椅子上，抡圆了皮带照许的脸上狠抽，顿时许的脸肿得老高，眼差点被皮带铜头打瞎，这样足足抽了十几下，边打边嚷：“你他妈的‘黑帮’子弟，就该狠狠揍！”他打累了，另一打手又抡起胳膊扇了许十几个耳光，又一脚把许从椅子踹到地上，一阵拳打脚踢，可怜许国庆满嘴满脸流血，动弹不得。接着又打彭小清，这位秀丽的女学生，几鞭子下去，白皙的脸就是几道血印，血从鼻子、嘴里流出来，他们不罢休，又是扇耳光又是用脚踢，彭连声惨叫，邹恶狠狠地叫：“资产阶级臭小姐叫什么，看你还敢不敢让革干子弟吃猪食！”彭被毒打几乎昏死过去，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直到现在提起当年情景，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文革”结束，“红旗”中明智的人向她道歉时，她说：“你别跟我提那时的事儿，我永远忘不了！”然后，历史反革命出身的晓宁、时华，摘帽右派出身的任冰、符芳等十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一被毒打，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的罪过就是出身不好，没有别的原因，祖辈的欠债，后代要继续还，老子反动，儿女永远是混蛋。这些学生当时只有十五岁，心灵的创伤与肉体的伤痕将伴随一生。如今打人凶手邹X X一直不敢见同学，学校、班里多次聚会他不敢露面。我想，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也在深深地忏悔吧。大家一直没见过他，但总在议论他，此人何为在“文革”前与“文革”中反差如此大？主要是他的心理变态，过去人们笑话他，他很孤独，“文革”的形势给了他机会，他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靶子来发泄，几乎打出人命。象这样的变态者，当时不在少数。“文革”残害了一代人，难道不该好好总结吗？

再看看校园里发生的其它事。校党支部书记刘美德、大右派的儿子朱同惨遭“红旗”人的毒打，肋骨被打断几根，长期被关在没有窗户的屋里。一个“红旗”打狗队的痞子杨某与李某不知从什么地方捉来一个他们称为“地主婆”的老太太，把她打得半死，扔在校园的柏油路上，然后杨骑着摩托车从她身上飞快压过去，老太太惨叫一声气绝身亡！惨啊惨！不知这是谁家的母亲，就这样惨死。草菅人命，随便杀人，这与当年日本鬼子、国民党匪徒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文革”中的一幕。

打人、抄家日益严重，报纸上连篇累牍发文章表示赞扬，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一点保证，激起了老百姓的愤恨，当红卫兵抄家时，他们组织保护自己的财产，有些红卫兵被打。这下激怒了红卫兵，他们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名曰斗争小流氓，把一些与他们斗争的、被他们称作流氓的人带到会场当场打死。这种会已开了两次，打死了若干人。又准备开第三次，“红旗”点名要朱同、沉默（上文提到的，说谁反对工作组就小心臭狗头的那位学生）等十几个学生参加大会。如果这个会真开了，这十几个学生甭想活着回来，早被当场活活打死，是周恩来总理听说后及时制止开会，挽救了这些同学，至今，他们还念念不忘周总理的恩情。

八月的恐怖，共和国的悲剧。恐怖的八月，历史长河的逆流。历史是割不断的，笔者用文字将校园三个月的事情记载下来，就是让历史警示后人，防止悲剧重演。学校本是纯洁神圣的地方，在“文革”中惨遭蹂躏，弄得满目仓夷，今天的年轻人听到这些有何感想呢？

如今共和国走上新的轨道，历史长河依然奔腾向前，北大附中“红旗小组”的头面人物当初是那么不可一世，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可不到一年便从高峰跌至低谷，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真真正正的昙花一现，因为他们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

终究是不会长久的。当然，这些人当时只是中学生，大都十几岁，虽然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但没有象聂元梓、蒯大富等大学造反领袖那样被绳之以法，但把当时的史实记载叙说，使人们记住野蛮、落后、愚昧教训，对历史是一种负责。

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吧，愿历史永远光明，我们的前景无限美好。

□ 《炎黄春秋》刊外稿

~~~~~

## 【峥嵘岁月】

### “文革”重灾区——北京大学灾难实录

• 李悔之 •

北京大学，是“文革”红卫兵发源地之一。也是“文革”的重灾区之一。

在北京大学，文革开始以后，第一个受难者是历史系的汪（竹+钱）教授。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历史系教授汪（竹+钱）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谴责汪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但是在当天夜里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程贤策，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在受到了很长时间的折磨之后，其中包括在头发上剃出一个十字型沟和被皮带抽打等等，9月2日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他从年轻时候起一直蓄留的胡子被强迫刮去。他被批判斗争和抄家。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杀。

6月11日和12日，有学生组织了“打狗队”，来打那些被看作“黑帮分子”或别种“敌人”的人。在“打狗队”看来，那些人不是人，而是‘狗’。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

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满是青紫伤痕，给他敷了药膏。胡寿文，生物系讲师，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一些教授，比如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拔草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说成是“装死”，不准送医院。当天夜里吴兴华死去。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不听他家人的反对，命令解剖了尸体

以图证实。吴兴华是诗人和翻译家，曾经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劳改队”。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45岁。吴兴华的艺术才华学术造诣以及他的死，告诉我们文革的铁轮选择了怎样的个人来碾杀，对人的生命、对文明、对民族作了怎样的伤害。但是，当谴责文革对吴兴华的杀害的时候，他的才华和造诣并不是我们的理由。我们要谴责的，是用无法无天的权力对人进行迫害和谋杀。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都不应该遭受吴兴华那样的对待。

8月24日，生物系的学生到讲师胡寿文家中用铜头皮带打他。他的衬衫粘进皮肉里。事后，他的妻子用温水泡软血衣，才把衬衫慢慢脱下来。1966年8月24日，英语教授俞大因（丝字旁）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自杀，她是中国一部最好的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

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在北京大学一万师生员工面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泽东五天后写的支持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小组的“红卫兵”的信中受到点名表扬。暴力行为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和提倡，全面兴起。

7月27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同时，也倡议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牛鬼蛇神劳改队”。“劳改队”这一形式立刻被确立，而且马上风行全国。前一阶段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都被强迫进入“劳改队”，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学校里“劳动改造”。“劳改队”中的人除了“劳改”，还被剃“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这样的自我诅咒的“歌”。在“劳改队”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应予的保障。校园里红卫兵掌权。对“劳改队”里的人，红卫兵要打要斗，都随便。为了不再是毛泽东说的其实已经相当残酷的“冷冷清清”，红卫兵就尽其想象地发明施用各种折磨侮辱人的方式。

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董怀允，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他作为“有问题”的人不准参加系里的大会，而被命令去食堂劳动，擦玻璃。6月18日他看到大规模的暴力性的“斗争”之后，曾与同室居住的人说起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恐怕难以承受这样的事。在7月26日的大会上，他看到江青这些最高权力者们要的就是“618事件”式的暴力性的“革命”。董怀允在1966年7月28日自杀。

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在“劳改队”里，和向景洁等人一起刷洗打扫学生宿舍楼的厕所。有一天程贤策被一学生叫走，他回来的时候，本来很密的头发中间被剃去了一个十字型的沟。接着向景洁也被叫去，程贤策小声关照他：“老向，千万稳住，别有特别的表示。”向景洁被三四个人按在椅子上，把他的头发剪了个乱七八糟。

程贤策、向景洁和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教授冯钟芸等人又被命令在胸前挂着写有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北大学生宿舍附近的商店一带拾检西瓜皮和清理垃圾。当时有大量的外校或者外地红卫兵来北大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商店前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拦住这些“牛鬼蛇神”，命令他们站在反扣过来的垃圾筐子上“自报罪行”，逼他们“交代”他们的家庭出身（因为那时候红卫兵特别强调家庭出身）。侮辱他们和打他们的事情每天发生。没有人制止这些暴行。只有一次，在通往北大南门的路上，有一个外国人，会说不地道的汉语，劝阻打他们的红卫兵说：你们这样作是不对的，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了。”他的劝说不起作用。

除了“劳改队”的折磨，“牛鬼蛇神”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其中较大规模的一次是，1966年8月15日，“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

万人大会“斗争”北大的最高负责人陆平。系一级的干部也被拉去“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都一律在胸前挂大牌子，牌子上除了他们的“罪名”如“黑帮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之外，还有他们的象死刑犯一样被打了大红叉子的名字，而且，他们都被强迫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的姿势，当时有专门术语，把这叫做“坐喷气式”。

附：文革中北京大学已调查到的死亡名单

1966年6月11日，历史系教授汪钱（竹字头）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1966年7月28日，数学系讲师董怀允自杀身亡。

1966年8月4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校园内“劳改”时，红卫兵学生强迫他喝水沟里从附近化工厂流入的污水。他中毒昏倒，却被红卫兵说成是“装死”。当天晚上吴兴华死亡。

1966年8月24，英文教授俞大因（丝字旁+因）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1966年9月2日，中文系中共总支书记程贤策，被当作“黑帮份子”遭到“斗争”和侮辱以及毒打后服毒自杀身亡。

1966年10月9日，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羞辱后自杀身亡。

1968年4月19日，19岁的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学生温家驹，因进入北大图书馆翻阅期刊，被北京大学的主要“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的驻二体武斗连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

1968年4月20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员李原，被说成“中统特务”，被关押进北京大学办公楼。当晚即死在办公楼三楼的一间房子里。关押他的人说他是自杀的，但他身上伤痕累累，所以他的妻子从大连赶到北京见到尸体后，认为是被打死的。他的妻子一直写信上告，没有结果。

1968年6月24日，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锬自杀身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卢被审查“历史问题”（他在抗日时期曾参加军队当翻译），他在喝下“敌敌畏”后因为非常痛苦，又用刀砍伤自己的手臂。

1968年7月19日，化学系器材室职员林芳（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锬的妻子）自杀身亡。

1968年8月28日，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服毒自杀身亡。

1968年10月16日晚北京大学教务长崔雄昆，从“清理阶级队伍”的集中地（当时全校教师、干部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28楼出走，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自杀身亡。

1968年10月16日，物理系著名老教授饶毓泰，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上吊身亡。

1968年10月18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隔离审查”中自杀身亡。

1968年11月4日晚上，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吴伟能自杀。在“火线学习班”，他在1959年的言论被揭发。他说过“幸福公社不幸福”，关于他的父亲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幸福人民公社”没饭吃的事情。他投圆明园小湖自杀。第二天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

1968年11月11日，数学系教师陈永和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在学校被关押时，跳楼自杀身亡。

1968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副校长翦伯赞夫妇一起自杀于北京大学燕南园64号。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东方语言系教师汤家汉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汤家汉自杀身亡。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西语系德语专业干部徐月如自杀身亡。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西语系德语专业教师程远自杀身亡。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教师蒙复地自杀身亡。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数学系老师张景昭被关押在学校的时候，一天夜里死在厕所

里。

1975年4月16日，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王重民上吊自杀身亡

□ 摘自李悔之博客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